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编 者 的 话

一九八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此，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发表讲话，报章杂志刊登文章，或追忆法西斯的暴行，或记述侵略者的可耻下场，或评论战后四十年来某些国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者从各自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不同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选出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讲话和文章，辑成此集。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今天的欧美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评价的。

本专辑收录的讲话和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其中的《原子时代》论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对当今西方世界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人们的心理所引起的变化；二是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斗历程，内中《在雅尔塔的幕后》记述了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的活动，并对这次会议于战后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加以评论。三是评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阴谋与暴行，以及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严重创伤和深重的灾难。这一部分中的《零点：广岛上空的四十三秒》，详细描述了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还披露了美国试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一些内幕。

限于水平，这本专辑在材料选择、译文和编辑中，难免有疏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

原子时代.....美国《时代》周刊(24)

日本——四十年的奇迹.....美国《新闻周刊》(72)

※ ※ ※ ※

零点：广岛上空的四十三秒.....美国《新闻周刊》(94)

日军的残酷罪行.....日本《世界》杂志(117)

日本关东军在“满洲鸦片帝国”干了些什么.....日本《潮》月刊(121)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对外政策阴谋的破产

.....苏联《国际生活》月刊(129)

在远东的胜利.....苏联《军事知识》月刊(136)

七七抗战的意义与启示.....台湾《时报杂志》周刊(140)

※ ※ ※ ※

在雅尔塔的幕后.....南斯拉夫《今日》周刊(144)

里根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的讲话.....美新署(154)

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战胜法西斯四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塔斯社(164)

辛德曼在柏林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集会的讲话.....德通社(182)

胡萨克在捷庆祝解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捷《红色权利报》(184)

波兰人民奋力为争取独立与自由而战.....波兰《新路》月刊(188)

罗马尼亚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191)

攻克柏林的决战.....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193)

易北河会师.....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19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美国) 约翰·兰 丹·柯林斯 帕特里夏·艾弗里

今天这个世界，或者可预见的未来的世界的面貌，是过去两个可怕的瞬间决定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午七点五十分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点十六分。一个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把美国从与世隔绝的天真无邪的美梦中唤醒。一个是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使全球永远处于警觉状态。

现在，在气候变幻不定的夏日，美国人正在回顾过去的历程：诺曼底登陆，越过莱茵河上的桥梁，爬上瓜达卡纳尔岛森林茂密的斜坡。那些曾被鲜血染红的土地在向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现已年迈的四十年前的战士们招手致意。他们已重返旧地，重温他们一生中决定命运的时刻。

五十九岁的詹姆斯·戴少将说：“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英魂最后安息。他们回来了，看到他们必须看的地方，而且他们了结了这段历史。”他在战争的最后战役中在冲绳岛受伤，现在就是这个岛的驻军司令，他是仍在服役的最后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海军陆战队军官。

现在年轻一代也有强烈的要求，想了解那个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着手拯救一个似乎要毁灭世界的年代。

那时涌现出无数英雄。他们有雄心有志向。他们在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称作“真正的战争”的一场战争中与魔鬼作战并获全胜。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有四十万七千三百一十六人献身，有六十七万八百四十六人受伤，损失了六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他们怀有一种天真的信念：美国是一个与世界隔离的，特别的，遥远的地方，是一个高尚的基本上不受别处人类罪恶影响的国家。

今天，这种概念已经消失，使广岛化作焦土的力量改变了这种概念。有人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在这样一个时刻终止，那就是核弹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到瓦尔多斯塔、佐治亚……或其他地

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将永远鞭策人们把原子释放的能量用来为人类服务，同时避免地球的毁灭。

然后就是看一下我们怎样从过去走到今天，看一下在那个夏天装上纱门和路边立着伯马剃胡膏广告牌的时代发生了什么，那时有多少好姑娘成了老处女，有多少优秀的小伙子为上帝为国家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尽管有那样巨大的损失，但战争仍向这块土地发出号令，要向一个更伟大的时代进军。停滞的经济开始发展，太阳带经济增长的基础已经奠定，妇女、黑人和穷人的机会开始不断出现。对许多人来说，美国的梦想已接近于美国的现实。

影 响

从珍珠港事件——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到报纸上出现欣喜若狂的大字标题“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只过了三年零八个月。

然而，这一千三百五十六天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国内的生活，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可以感觉到变化的浪潮。

繁 荣

一种上升的潮流

战争留给美国国内的所有遗产中，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力量。国民生产总值受到战时开支——总共一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用于二十九万七千架飞机和其它军用物资的推动，开始螺旋式上升，从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三万七千亿美元，增加百分之三千五百六十三。

计时工资大幅度提高。现年六十七岁的巴巴拉·赫宁伯格先是在佐治亚一家洗衣店工作，一小时挣三十五美分，后来换了“能挣钱的工作”，在底特律为B—17轰炸机固定方向舵和升降舵，一小时拿一点三五美元。她在回忆当年的往事时炫耀说：“我买了一件红狐皮外套。我

按时付了款。我把它改成了一件披肩，现在还放在楼下。”

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五年之间，美国人贮蓄了一千三百六十亿美元——超过一九三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个人除去所得税的收入也开始稳步上升，从一九四〇年的人均收入五百七十美元上升到一九八四年的人均收入一万零八百八十七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八百一十。

广告使用户第一主义盛行起来，广告又在电视的配合下甚至把繁荣的景象送进穷人家。制造商不遗余力地兜售商品。一家杂志在做广告时大肆宣传：“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当他永远回到家时你们会笑，你们会爱，你们会快活地生活。我们也希望，你很快会发现美国最受欢迎的银餐具也永远返回你的家里……”

战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任务就是把一个租赁人的国家变成一个房主的国家。自一九四五年起，房主的人数骤然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四，现在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完全是房主居住的。

郊区有了爆炸性发展，到一九八〇年，人口增加了三倍。由联邦提供资金修筑的六十万英里道路大大缩短了进城的时间。汽车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已注册的汽车到一九八四年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百，达一亿三千零一十万辆。

华盛顿迫切要求在国外发展自由贸易，以便为加速发展的美国经济提供市场。美国的进出口额开始急剧增加，进口额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八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四十六，出口额增加百分之八百四十四。美国的直接海外投资也扩大了，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四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千，达二千三百二十亿美元。

在战时发展的激发下，经济已从农业和制造业转向高级技术行业和服务业。今天，百分之五十八的美国人在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服务部门工作，这些人数是大战结束时的两倍。

在飞机制造工业基础上起家的高级技术在四十年之后已把宇航员送入太空。仅从一九七二年起，在有代表性的高级技术工业部门就业的人数已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七。在类似的一批烟囱工业就业的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

很容易受到高等教育，这在今天不断上升的年轻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直到战后几年，普通的美国人才真正能得到这种机会。

为了防止大约一千五百万重返家园的老战士挤满职业市场而制定的

美国军人法案提供了奖学金，这使八百万老战士可以继续受某种形式的教育。到一九四八年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弗兰克·纽曼指出，这项法律“打破了什么人能上大学深造的障碍，它排除了那种认为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家庭背景才能入学的思想。”

六十五岁的赫伯特·埃文斯回顾道：“我深深体会到一种紧迫感。他在欧洲一个全黑人部队服兵役之前在芝加哥夜总会卖苹果和跳踢踏舞。他回国后在霍华德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并在圣约翰大学法学院以他班里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埃文斯这位前纽约州首席法官现在是纽约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说：“我这一代的许多人都因为有了这项美国军人法案而接受了教育。”

中学的学时也从一九四〇年的八年半增加到一九八三年的十二年半，美国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现在拥有中学文凭。大约有百分之十九的美国人拥有大学学位。

妇 女

“罗斯”获得了她应得的权利

妇女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开阔了她们的眼界。萨尔·勒维丹和克利福德·约翰逊在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准备的报告中说，战争时期，妇女承担了去前方打仗的一千二百万男人的工作，从而“彻底洗刷了那种禁止中产阶级人家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莫大耻辱。”

“铆工罗斯”已成为一种象征。从一些广告画上的文字说明中可以看出，妇女愿意工作：“为了胜利，我能干些什么？”在另一幅广告画上，画着一名妇女弯曲着手臂，上面有四个大字：“我们能行！”勒维丹说：“现在干男人的工作不再被视为轻佻的女子，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到世界大战结束时，有工作的妇女已在一九四零年的百分之二十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一九八四年，参加工作的妇女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得克萨斯州麦卡伦的七十一岁老人玛格丽特·波西曾在地兄弟去打仗以后当过生产鱼雷艇引擎零件的精密磨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我好象在尽自己的责任。我尽力而为。”

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七十七岁老人西尔玛·朗博追忆说：“要不是这场战争，我至今仍然无所事事。”朗博是一家航天公司的高级技师，现在已经退休。

母亲纷纷参加工作，为八十年代能有百分之六十一的母亲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由于在战争时期打下了基础，妇女从那时以来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责任。现在她们就职于最高法院，竞选副总统，进入总统内阁，担任大使、参众两院议员、市长、州长和公司领导人。

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女经理迅速增加，与最初的人数相比已增加了百分之八百。现在美国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中约有一半是妇女。

那时就象现在一样，由于妇女的眼界不断开阔，经济上独立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促成离婚率上升。一九四六年是那个时期以来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超过。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很多婚姻破裂了。

（※：“罗斯”和文中的“铆工罗斯”是美战时女工的统称，因男子参军，大批家庭妇女进厂做工，故有此名。据说所根据的事迹是一个叫罗西娜·博纳维塔飞机厂女工，她与一个同事在六个小时内焊了机翼上三千五百四十五枚铆钉，一九四一年曾据此演出一个音乐喜剧。——原编者注。）

少数民族巨大的进步

黑人主要居住在南部农村，在那里只能找到简单的工作。战后他们发现大门向他们敞开了。军事部门，即使在种族隔离的部队里，已把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安排在一起，抛弃了地区上的偏见。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军队完全取消了种族隔离。

国防工作使成千上万的黑人来到北方，以获得高薪工作。这促使东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黑人人口迅速增长，到八十年代，黑人人口已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一九四一年，约翰·亨利·帕特森辞去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一家教堂里周薪仅十二美元的看守工作，到底特律福特公司所属的里弗·鲁日联合工厂的医院工作，每周薪金一百美元。他家最后买了一座房子，还培养了两个儿子读书。七十五岁的退休工帕特森说：“要是我们一直呆在南方，这些根本办不到。”

战时来北方的这代人的子女享受的好处更多。三十二岁的小康拉德·马利特从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法律学位，现在担任底特律市市长科尔曼·扬的行政助理。他说：“如果他（我的父

亲)不迁居这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他在底特律市得到的东西,显然在得克萨斯州是得不到的。”

战后归国的黑人士兵反对种族歧视,导致了十年后的民权运动。会议委员会劳工经济学家奥德丽说:“黑人已从非常孤立的文化解放出来。他们以从未有过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

学校变成了取消种族隔离的战场,为取消种族隔离开辟了道路。今天,黑人高中毕业生占黑人总数百分之五十九,大学毕业生占百分之十,是战前的八倍。现在大约百分之六十的黑人家庭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当于一九四七年的两倍。有房产的黑人家庭增加了一倍。

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黑人都获得了政治权利。全国有六千零五十六人担任了民选要职,其中美国众议员二十人,州议员三百九十二人,市长二百八十六人,市政府成员二千一百八十九人。

流动性涌向其他地方

就象海啸席卷大地上的花草树木一样,这场战争使大约二千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迁居到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生活。在短短的几年里,人们从小城镇移到大城市,又移向郊区。美国人在寻求梦境,他们并不看重传统习惯。一种为移民服务的民族文化同化了地方语言和风俗习惯。

大批人来到了国防工厂,开辟了这个阳光地带,给就业、生活和退休带来了吸引力,并持续至今。詹姆斯·德里斯凯尔一九四一年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单程机票离开了皮奥里亚,决心一去不归。他说:“你就是用几匹野马也甭想把我拉回伊利诺伊州。如果一直呆在皮奥里亚,我肯定还象战前一样,仍然是一名职员。”然而,六十八岁的德里斯凯尔现在是罗克韦尔国际航空公司的顾问。他说:“航空工业的扩大和飞速发展决定了我的生活。我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自己已成为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这是无法代替的。”

对于在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二零年期间移居美国的二千四百万人的子女来说,战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开端,从此跳出了只有移民邻居之间紧密团结的小圈子。

其他成百万的人选择了不再务农的道路。一九四零年,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人口,即三千一百万人还以务农为生。五十七岁的邦尼·普萨

特里是在她十八岁那年她父亲放弃了在印第安纳州福尔索姆维勒附近干的农活以后去芝加哥到一家国防工厂工作的。她说：“你不要为了安稳就老呆在某一个地方。我想要是我老呆在那里，我难有今日。”

象许多其他移居城市的人一样，普萨特里同样经历了工作、结婚和迁往郊区的过程。时隔三十一年，普萨特里一家现在住在芝加哥市西面的洛姆巴尔德。随着孩子们长大，离家而去，普萨特里夫妇目前正在考虑移居它处。普萨特里太太说：“我准备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和兴趣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将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年迈的人现在已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战后的流动性把曾经是敬养年迈双亲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分开了。现在老人和自己的亲属而不是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只占百分之十四。

这样大的变迁是付出了代价的。诺曼·罗克韦尔曾经在《星期六晚邮报》中描写的旧美国情景已经无影无踪了：大家聚在一块谈论乡下的医生，一群人围着收音机欣赏节目，在后院篱笆下有人悄声细语地谈心，还有在周末有三四代人参加的家庭野餐会，所有这些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六十二岁的好莱坞剧作家厄尔·哈默说：“我最大的怀念就是向往那个时代。”他创作了一部思念故乡的电视连续剧《沃尔顿家族》。他说：“我们现在实在太可怜了。”

由于战后出现了许多全国性的大企业、移居已成为和平时时期雇员中有抱负的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必经之路。美国家庭现在平均每隔四年移居一次。这往往要付出感情上的代价。”就找工作而言，移居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工作，”三十七岁的比尔·贝利说。他干过向西弗吉尼亚地区的服务站兜售生意的工作。十三年来，他一共迁移过六次。

贝利和她的妻子都深知经常搬家的难处：要给孩子更换学校，重新结识朋友和医生。他说：“你总是没有一个安静的栖身之地。有的人老是把家具搬进搬出。”

他的妻子雪莉，今年三十二岁，对此不无同感：“我老是想知道，‘哪里是我的真正的住所？’”

这对夫妻最近决定拒绝和一家公司一起迁到旧金山去。贝利一直忙着换工作，这次他要留在休斯敦了。原因何在？“为了扎根。”

政府庞大机构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的公司行政机构，也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行政机构。华盛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参与了美国人的生活。在一九四一年，只有一千三百万人交付所得税；而今天，纳税申报单的总数有一亿份。此外，除农民外，美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家庭目前都得到政府某种形式的补贴。

军队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始终没有减少，这种作用是在战时形成的。今天的繁荣有一部分是建立在里根政府的为期五年、耗资达一万亿美元的国防建设基础上的。军费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军费总额达三万四千亿美元以上。

如果说联邦政府看来对许多人来说是疏远的，那么私人企业也是如此。目前，美国拥有二百九十万个公司，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六百零七。跨国公司是在战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公司目前经营着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企业。公司资产价值在一九四〇年为三千二百亿美元，而现在已达到九万三千亿美元。

在公司扩展的同时，工会也发展了，使得许多工人一方面受一个大组织的保护，而另一方面又为另一个组织做工。农业也一样，由于农场数目减少了近三分之二，而平均耕地面积却扩大一倍多，于是农场便改为大规模经营。目前，所有农产品的价值有四分之三是由五万九千七百九十二个为公司所属的农场创造的。

各个院校在战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同样为各大学的大量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大学对可能把学生的教育置于次要的地位表示关切。据全国科学基金会估计，目前各院校所进行的基础研究的全部经费有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提供的。斯蒂夫·沃尔克，现年二十四岁，是个化学系的研究生，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每月挣钱约七百美元。他说：“这是一种交换，要是没有政府的研究计划，我就不会有机会在研究院学习。”

退伍军人

伤痕与回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停止了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伤亡人数

仍在增加。有四百五十万美国人在造船厂工作，他们建造了七万一千零六十艘船只。在这些人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现在正遭受着可能使人致命的石棉污染的不良后果。卫生专家们估计，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因接触石棉而遭受的危害最终将夺走七万四千名造船厂工人的生命。比尔诺森是加利福尼亚州纳帕人。他是石棉的受害者，每天八小时靠氧气罐呼吸。他说：“这就像患无休止的流感那样，无法治疗。”

战时的创伤至今还影响着许多的退伍军人。有五十七万九千八百九十八人还在领残疾人员抚恤金，有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八人领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者的抚恤金。

爱德华·费希尔在菲律宾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后患病达四十年之久。他说：“几乎一切可以想像的苦头我都吃过了。我这种情况不是什么例外，和我处境相同的人还很多。那次的巴丹行军是无益于健康的。”

哈罗德·拉尔夫，是在长崎的美国占领军中服役时遭到辐射的危害的一名水兵。他是在一九七八年，即在对那个城市投掷原子弹的三十三年之后死于骨髓癌的。他的遗孀琼回忆说：“一九七六年，每当他打喷嚏时，每当他抓住门把手时，他的骨头便象糟木头一样开始折断。”

但是那次大战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后果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教科书仅以极少的篇幅记载那次大战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后果。朱利·戈茨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八五届毕业生。他说，“越南、水门事件、石油危机——这些都是与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的事件。”

《美国的凯撒》和《告别黑暗》两本书的作者维廉·曼切斯特是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退役水兵。他说：“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否定过去。”他又说，“学生们会告诉你，那次大战与现实不相干；他们用的字眼是‘不相干’。现在，我认为，人们最终还是开始回顾过去这段历史了。”

原子时代

美国最优秀的智囊制造出一颗威力非常强大的原子弹，迫使日本屈膝投降，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人类对原子的可怕潜力仍然感到惊奇。

然而，今天的挑战同广岛事件之后的挑战仍然是一样的：使技术成为改善生活而不是生产致命武器的工具。

世 界

超级大国互相规避

一个单独的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毁灭文明世界。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它们的巨大核武库的这种摧毁力量，使两个超级大国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不得不非常谨慎。

几十年来，华盛顿和莫斯科玩弄有时令人胆寒的国际边缘政策游戏，不惜一切代价研制越来越致命的武器，同时谨慎地避免直接对抗。

与此同时，世界日常事务照样进行，国际危机依然发生，好像原子弹根本没有研制出来一样。譬如——

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几乎不顾忌美国的报复，比如最近在贝鲁特劫持环球航空公司847客机事件。

第三世界的敌人，如伊朗和尼加拉瓜，藐视美国的核武器，抗拒美国的威望和实力而不受任何惩罚。

日本由于有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免除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沉重负担，开拓了新技术，结果从美国那里夺走了更多的市场。

尽管部署在世界各地的五万件核武器对世界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发生影响，但它们却显著地改变了核俱乐部的所有五个成员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战略。一场核战争将在半小时内在美国和苏联各屠杀掉一亿人，这使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谨防纠纷积累起来。

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说：“这样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大灾难——不仅是难以描绘的，而且是难以想像的。”

结果，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都奉行这样一条方针：最要紧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阻止战争。

曾经出现一些真正的恐慌：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期间；一九六一年柏林墙危机；一九六二年在古巴因导弹发生对抗；以及一九七三年第四次阿以战争。五十年以前，核时代还未到来的时候，任何这样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每一次局势都缓和下来了。卡特时期的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保罗·波恩克说：“现在倒比没有核武器的时候较少战争恫吓了。”

美国和苏联都谨防干涉彼此的势力范围。四十年来，美国在它的核

力量的支持下对西欧安全承担着政治义务，使苏联不敢对华盛顿的盟国发动常规进攻。

同样，美国仍然不愿涉足克里姆林宫的地盘——被苏联人看作是他们的一个省的东欧。

显然，原子弹的出现并没有消除战争本身。尽管美国拥有那么大的原子实力，仍然不能阻止或者甚至不能制约中国、古巴、伊朗或尼加拉瓜的革命。越南战争是在没有诉诸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美国把这场战争输给了无核国家北越。在美国看来，引起俄国或中国核报复的可能性所冒的风险太大了。

对苏联方面来说，它的强大的核力量并没有阻止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华沙的暴动。

根据沃恩克的想法，结论是：“核武器根本就不是军事武器。核武器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是阻止对方使用他们的核武器，或者发出使用自己的核武器的似乎可能的威胁。”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世界正准备停止扩充越来越大的核武库了。

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保守党政府正力图扩充英国的核力量，以三叉戟系统来代替过时的北极星导弹潜艇。这个行动将吃掉常规部队的费用，因而导致一位反对者——陆军元帅卡弗勋爵最近指责伦敦政府“对庞大的核力量想入非非”。

在法国，最近对十五至二十五岁的人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七十二以上的人认为法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力量，以便确保自己的国防。法国也在增加核武器费用，核武器费用现在占整个国防预算的百分之二十。

在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核武器”是合算的。同一般人想像的相反，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较多地依靠常规军力，往往使许多国家的国防开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MX导弹、B—1轰炸机、三叉戟导弹潜艇、巡航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的费用只相当于五角大楼花在兵员上的费用的三分之一。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建立和运用所需的费用只占整个国防费用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尽管如此，宣布放弃军备竞赛但得到其他国家核保护伞保护的 国家，显然在经济上捞到了好处。

纽约莱尔曼研究所的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说：“没有美国的核保

护，日本将不得不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花在国防上面，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花百分之一，节省下来的钱造成了日本经济的繁荣。”

日本没有认真去想发展核武器，但超级大国要想劝别人不加入核俱乐部，或者想把自己的巨大核武库包藏起来，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科学控制原子

曾被用来杀死十万广岛居民的同样的技术，现在用来治疗疾病并使全世界的几十亿人民的生活更舒适。

从微波灶、夜光表到核电站和原子医疗，原子所产生的东西比近来战争史上新的可怕的一页要多得多。

虽然迄今原子武器的使用只局限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两次核爆炸，但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技术却在迅速地发展。

国家标准局辐射测量处处长埃尔默·艾森豪威尔说：“现代生活中放射技术的使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比率增加。”

在美国，应用原子技术的例子很多，其中包括——

- 用伽马射线照射肉、奶和蔬菜，使之不用冰箱、杀虫剂或防腐剂而保鲜数月。

- 几十艘核动力潜艇和商船以高达三十节的速度在大洋上航行，而且航行十二年不用添燃料。

- 利用功率强大的原子加速器射出的能量束，内科医生可用速原子微粒精确轰击大脑的某一部位，杀死癌肿瘤。

- 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工程师利用核辐射检查喷气发动机的叶轮片，找出金属疲劳或其他有毛病的地方，从而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延长数年。

- 通过测量体内化学物质的放射性，医学研究人员可以查出微小到百万分之一的物质，从而使婴儿的遗传缺陷的早期检查成为可能。

只有当科学家和工程师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原子的威力来进行破坏之后，他们才找到原子技术的这些有益用途。前原子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戴维·利连撒尔说：“我们决心证实这个发现不仅仅是一种武器。”

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倡导者中，最美妙的理想是核裂变发电。这将是最终的能源，可以“非常便宜地供给”电力。

在核动力科学刚刚兴起的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核发电的前景的确似乎是无限广阔的。一九五七年第一座商业核反应堆交付使用，今天八十七个核工厂提供美国发电量的百分之十四。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核发电工业一直在持续发展，后来，一系列的灾祸和失算使这门工业遭受了损失。

三英里岛：一面警旗。一九七九年，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的一座核发电厂关闭了，这座工厂的一个阀门卡住了，造成一部分铀燃料被溶化。虽然渗漏出来的核辐射量微不足道，但这起事故使公众对核工厂安全的担心表面化了。

国会迅速表决，停止修建有争议的克林奇河增殖反应堆，这是一个本来要使用新式方法进行核发电的发电厂。一九八三年，华盛顿公共动力供应系统由于推迟修建核电厂而负债，不能偿还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债券，这是有史以来不能偿还的最大一笔城市债券。

去年六月，能源部决定停建俄亥俄州的一座浓缩铀工厂，尽管为建这座工厂已花了二十六亿美元。

对于公用事业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原子工业论坛报告，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再也没有修建新的核工厂的订货了，分散在十二个州的二十八座未竣工的核工厂的厂房正在生锈。仍然在修建的四十八座核工厂都为成本大大超出而叫苦不迭。

使情况更加不妙的是缺乏处理核废料的安全地址。能源部计划耗资一百亿美元，在得克萨斯、内华达或华盛顿三个州中的一个州修建一座核废料贮藏所，但政治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选择地址只好拖到九十年代。

另外一些分析家说，日本、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核动力及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安全纪录，足以证明核动力在当今的经济中是能够获得成功的。譬如，法国可望在五年之内使核反应堆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比利时、瑞典、芬兰和台湾的能源需求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依靠核动力。

成本和安全问题也困扰着原子医疗事业，但困扰的程度要低得多。放射性治疗几乎在一发现天然放射现象之后就成为卫生保健的工具。今天，所有医院病人中有一半经过放射治疗或放射性诊断化验。

钴、碘、铯和其他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注入体内后，可以追踪癌症、阿耳兹海默氏病和其他疾病的踪迹。

精确地映出大脑和其他器官的三面图象的现实可能性，促使更多的

医院投资一百万美元乃至更多的资金购买核磁共振设备。使用这种方法时，病人放置在一个功率强大的磁场里，这个磁场使体内的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从而使医生可以诊断出早期的癌症和其他疾病。

除了这些发现之外，原子时代的后来的篇章将由这样一些机器来填写，这些机器既可打碎原子，又可将它们聚合成新的元素。世界上至少已有十几个实验聚变装置，更多的这种装置正在制造之中。

社 会

原子弹的阴影

当广岛被炸的消息传来时，纽约的一位名叫佩勒姆·马诺尔的母亲正在生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后来写信给播音员H·V·卡顿伯恩：“我想笑也笑不出来；对于我们的两个小男孩来说，未来似乎是极端的冷酷无情。”

在核时代的最初岁月里，许多其他人经历了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美国人学会了适应核时代的环境。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保罗·博耶说，美国同原子弹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最初的震动之后，紧接着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默认阶段，人们慢慢明白这里存在着原子武器。

到了一九五四年，人们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越来越担心，从而迎来了行动主义和焦虑的时代。年轻人演习在听到警报后往学校课桌底下钻，人们在地下室和后院修建放射性尘埃掩蔽所。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人们的担心达到高潮，第二年平静下来了，因为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博耶说，从那时至一九七九年，美国进入了“大睡”的时代。博耶写了一本书，论述原子弹对文化的冲击，这本书将于今秋出版。随着试验转入地下，核创伤逐渐消失。

分析家们说，美国进入了行动主义重新活跃的时期，这是由于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造成的。这轮循环到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达到了峰巅，核冻结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们就战争与和平问题给教区教友写了一封公开信，“对于从道义上理解核武器的使用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自那以后，反核运动失去了一部分活力。